

## 以文为戈

刘武专栏

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,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## 柯棣华往事

一个外国大夫能让中国人记忆那么多年,一定是有些东西打动了人们的心灵,让人相信某种精神的确可以永生、不灭。

前些日子,我拜见了一位94岁的老革命,他告诉我,著名的柯棣华大夫曾经亲自给他治过腿伤。

那是在1941年冬天,这位老革命当时才20多岁,在山西遭遇敌人伏击撤退时,他的右脚踝被树杈刺破,并在渡河时灌进了沙粒。转天,他的右脚就肿得像个大西瓜,小腿肿得像小水桶,痛得不能动弹。军区卫生部的几个医生会诊后说,他的伤势过重,只有切掉右小腿才能防止病情恶化。

又过了一天,一个两颊消瘦、皮肤黑红、留着黑黑小胡子的医生来给他检查伤势,这位医生就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外科大柯棣华。柯棣华看过他的伤情后表示,不用动手术,只要把伤口中的沙子清理干净,就能愈合。

此后十几天,无论刮风下雨,柯棣华都亲自来给他换药,一开始每天换三次药,有时一次要用半个多小时。在柯棣华大夫的细

心护理下,经过一个月,他的腿伤完全愈合,甚至没有留下一点伤疤,然后出院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

整整70年过去了,这位老革命提起柯棣华来,仍是一往情深,怀念不已。凑巧的是,几年前我去印度时,也专程到孟买柯棣华妹妹的家中,拜访过他的三个妹妹及其亲属。

柯家位于孟买老城区一幢十分普通的居民楼内,这种房子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居民楼差不多,房间小得让我有些吃惊。

房间里正对大门的位置,摆放着柯棣华的半身塑像。塑像下方的小牌子上用英文写着:德瓦卡纳特·桑塔拉姆·柯棣尼斯大夫,1938年至1942年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,1910年10月10日生于印度绍拉普尔,1942年12月9日在中国河北省葛公村逝世。

德瓦卡纳特·桑塔拉姆·柯棣尼斯是柯棣华的原名,当时与他同到中国的另外4名队员,也都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了一个

“华”字,以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热爱。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摆放着柯棣华的中国夫人郭庆兰的照片,多年来,柯家一直将郭庆兰当做亲人。据介绍,她从1958年到2004年曾5次访问孟买,与柯家人相见。在中国国内,她也多次与到访中国的柯家亲属会面。今年6月28日,郭庆兰因病去世,享年96岁。

柯家房间内最引人注目的,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为柯棣华大夫亲笔写下的挽词,它写于1942年12月29日,也就是柯棣华大夫去世20天后。挽词上写着:“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而来,援助抗日,在延安、华北工作五年之久,医治伤员,积劳病逝,全军失一臂助,民族失一友人。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,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。”

如今,挂在柯家房间内的便是毛泽东的手书原迹,说起它来,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。1978年,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

会会长王炳南先生率团访问印度,他在柯家看到毛主席书写的这张挽词没有装裱,不便保存,就提出把挽词带回中国去装裱。就这样,他们带走装裱好后,又委托中国驻孟买总领馆把挽词带回了柯家。

柯棣华的五妹瓦萨拉是位针灸大夫,印度医学协会会员,她曾在孟买开设私人诊所,为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。回忆起柯棣华,老人感慨万分地对我说:“他去中国时,我只有11岁。这之前,我们经常在同胡里一起玩游戏,那种无忧无虑、兄妹相欢的情景,至今浮现在我眼前。他到中国后,经常给我们写信,讲述他与当地医生一起工作的情况。”

在柯棣华大夫的影响下,柯家后来先后有12人从医,一家三代参与中印文化交流。

我想,一个外国大夫能让中国人记忆那么多年,一定是有些东西打动了人们的心灵,让人相信某种精神的确可以永生、不灭。

## 呼吸之间

刘亚伟专栏



刘亚伟,笔名亚子,北师大研究生学历,原籍曲阜,下过乡,当过兵,资深报人,现为自由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
## 军装情结

可以说,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国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印痕。

收拾换季的衣物,在箱底发现了一顶旧军帽,严格说,它不是军帽,只是一件仿制品。怎么来的记不起了,却让我回想起它所代表的“1960”那个全民尚武的年代。还记得当时毛泽东曾有诗曰:“飒爽英姿五尺枪,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“全民皆兵”、“军民团结如一人,试看天下谁能敌”、“七亿人民七亿兵,万里江山万里营”等等,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。

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都还记得,电影院里上演的是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小兵张嘎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英雄儿女》;书店里卖的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、《雷锋叔叔的故事》;广播喇叭里播放的是《长征组歌》,这些都让当年满腔热血要求进步的青年人无限地崇拜与信任军人,玩游戏争着要扮演解放军,长大后的理想是参军扛枪、保家卫国。因为参军光荣,那时参军人家门口都挂着一块“参军光荣”的红匾。在人们心中,身着草绿色军装、佩戴着肩章的军人,是一种象征,也是一种权威。看到绿军装,

就会有一种无名的敬佩与爱戴油然而生。

当时,虽然绿军装流行的趋势已经呼之欲出,但是真正成为社会时尚的潮流,还有待于一个契机。1966年8月18日,这个契机终于来了。这天,毛主席身穿绿军装,登上天安门,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,一个红卫兵代表为领袖佩戴红卫兵袖章,领袖问她姓名,答曰:“我叫宋彬彬。”“哪个彬?”“文质彬彬的彬。”领袖说:“要武嘛。”第二天,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向群众挥手的侧面大照片,就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。

那个年代没有时装秀,也没有电视广告。1966年8月19日那天,几千张报纸印着领袖身穿绿军装的照片,立即传遍了全国,这是现在任何一场时装秀和任何一种媒体广告都比不了的。从此,一身绿军装,头戴绿军帽,腰扎军用腰带,肩挎军用挎包和军用水壶,脚踏一双军鞋,再加上一个红袖章,就成了那个年代最正统、最革命的服饰形象。

与此同时发生的,是旗袍、西

服、包屁股裤等等在一夜之间统统成了“四旧”,被无产阶级的“铁扫帚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

我的这顶仿制军帽,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。我戴着它,跟随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参加大串联,由曲阜徒步穿越沂蒙山区,抵达青岛,准备从那里坐船前往天津,再去北京。我们一行16个人,几乎每人身上都能找出点与解放军有关的东西来:一件绿军衣,一条绿军裤,一顶绿军帽,或是一只军用水壶,一双绿军鞋……背包也都像解放军那样,打成井字形的方块。

当时,各行各业凡是有条件的人,无不想弄一身军装穿在身上。实在没办法,又羡慕得不行时,就有人开抡了:一个戴军帽的人正在街上走着,后面突然追上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,一把从那人头上摘下军帽,飞驰而去。

就连刚出生的婴儿,也过早地有了军人的标志,家长在帽子上用红布缝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,有时还会在给孩子们做的小军服上缀上领章。

知青们穿着军装到了农村,又

把军装潮蔓延到了农村。军装潮好像一直热到上世纪70年代。

有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,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热烈地追捧军装,除了上述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原因,在心理需求的层次上,大概是因为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、组织美、仪式美。身穿军装,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,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,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。在身穿军装之时,个体感到了融入群体的巨大快感,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,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。可以说,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国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印痕。

今天,人们的生活早已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。对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代人来说,无论今天身上穿的是多么昂贵和花样翻新的时髦服装,旧日身穿军装时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但是那些红装素裹的日子,依然会像我这顶旧军帽一样,久久地压在记忆的箱底。

## 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络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## 雪中人

我们就是这样,把别处变成风景,在陌生的地方寄托愿望,沉湎在桃源之梦里,诗意都来自隔膜。

已经不记得,这是入冬的第几场雪了,早晨醒来,窗外的原野上一片素白,几棵大树挂满了雪,像白色的珊瑚。

在微信上搜索附近的人,外地人倒多起来了,而且多数来自南方。原因倒也不难想见——我们这里有一座滑雪场,规模虽然不大,在西北也算少见。滑雪场的存在,让小城的旅游期从过去的五个月,延长到了全年,而且吸引了大量南方人。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个地方的?我很好奇。到他们微信关联的微博上看过之后,搜集到的关键词多半是“冷”、“安静”、“诗情画意”、“民风淳朴”、“烤全羊很好吃”,配以滑雪场和饭桌上牛羊肉的照片。

四方田犬彦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与《冬季恋歌》有关的文章,在谈

到这部由裴勇俊主演的电视剧为何会受到韩国观众热爱时,他说,南北朝鲜的分裂,让韩国没有了北方,基于一种心理补偿作用,冬天、北方、雪常常会在大众文艺作品中反复登场,电影《冬天的女人》、歌曲《冬天的旅人》都曾轰动一时,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在韩国上映时,观众人数是日本的三倍之多。在他看来,更重要的原因是,《冬季恋歌》是一个没有时间感的故事,剧情的时间跨度并不小,但同时期的韩国大事都没有出现,剧中人完全没有被社会的剧烈动荡影响到,在一个真空般纯净的环境里恋爱和思念,这符合人们对这类文艺作品的要求:“在乌托邦中,时间是不能流动的。如果爱的乌托邦能够实现的话,其中的一切都必须像北极星一样永恒不变。”

我们的小城,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,成了旅游热点。它符合南方人对北方的想象,有大雪、旷野、高山、木屋,而且,相比南方,这里的发展要慢半拍,小城的房屋和街道,都比较老旧,一切似乎都停留在一二十年前,给人一种身处时间之外的错觉。他们不知道,小城中人,也有时代感非常鲜明的烦恼,也一样被时代之手所左右,但如果有一个小城居民——例如我,走出来向他们展示这一切,一定会惹人厌烦。对游客来说,最扫兴的事,大概就是风景中人突然出画,或者日常生活里的场景再度出现。

旅行是一种出走,是和过去生活的隔绝,人们不需要也没必要换个地方重温熟悉环境里的感受,他们只负责向景色投以 John urry 所

说的“游客凝视”,浮光掠影,点到即止,让大雪的旷野成为画卷,让画中人静止在民风淳朴的印象上。即便偶尔有人怀着强烈的愿望,想突破这种隔膜,深入到风景深处,也会因为时间、心理的原因,难以达成愿望。

所以,即便我努力拒绝成为“西北景象”中的人,对这种总是要扮演画中的命运感到不耐,一旦遇到南方人,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小城时,还是会从那座山和那个滑雪场开始。而当我去南方,去那些古朴小镇时,怀揣的也是同样的愿望,不要让我知道太多,不要让我看见染头发的青年,而是只给我留下“民风淳朴”的印象。

我们就是这样,把别处变成风景,在陌生的地方寄托愿望,沉湎在桃源之梦里,诗意都来自隔膜。